

第二章 《史記》中的想像質素

一、想像與《史記》

《史記》一書在我國文學與史學兩界備受矚目與肯定，歷來也引起文、史兩個學門的廣泛討論。若今日我們以文學的角度切入，則司馬遷在人物形象塑造及寫作技巧方面的成就無疑地已在文學史上取得一種「標竿」的地位；然若改就史學的眼光來看，這樣的「文學性」卻並不會影響《史記》在史學方面的價值。乍看之下兩者之間或有互相扞格之處：因為文學大抵算是一種主觀的、富於「創造性」的活動；而史學家卻必須多方查證，蒐羅探訪紛紜龐雜的舊事佚聞，以圖還原歷史真相，則屬於一種客觀細密的研究工作。

而現今吾人論次《史記》之餘，必不能忘記其為「史書」的身分。若率爾將之歸以為純文學來看待處理，不僅不夠周延妥當，論點更可能失之偏頗。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能去探究《史記》文字當中屬於藝術美的部分，而是《史記》既之為「史」，在探討其文學屬性時，要先能理解「歷史」求真的背景，如此一來，吾人論述才不致淪於不著邊際的闊論空談。所以若要談論《史記》的文學性，則「傳記文學」應是一個理想的切入點。因為傳記的本身正有如肖像之畫：若是照樣描摹，則未免呆板缺乏生氣，徒淪「照相」之流，談不上美感；而若要傳神地掌握主角的氣質神韻，一切便但憑畫家的感應，而這感應便是抽象不可言說的，接近藝術層次方面了：

解說「傳記」有如肖像之畫，最可靠的仍須還原到它的材料價值，那價值

或是較真實的；此外加於那真實材料上的，都是藝術、詩、想像或幻想的成份。¹

二十世紀初法國的傳記文學作家莫洛華氏也曾對此有過深刻的論述：

我深知道，即使有學問的人也未必總能不為強烈的情感所左右。歷史家未必總能保持自由探討的精神。傳記作家更不能；他是人，他的傳記主人公會激發他的一種愛或憎，而那種愛或憎有時會歪曲了他的判斷。有時他會燃起宗教的熱情，有時他會燃起倫理的熱情。認為現代傳記作者是一個完全不偏不倚的人，乃是一種可笑的想法。²

所以，傳記文學求真的前提是和歷史並無二致的，但要完成一篇好的傳記卻不能不投入作者豐富的情感於其中。既求真，亦求美，是傳記文學的要求，同樣也是優秀的歷史著作所應具備的條件。文學需要想像，建構歷史真相又何嘗不然？是故接下來我們將分別就歷史和文學與想像的關係加以論述，以便於洞察在想像的地帶裡，《史記》何以能同時兼備歷史求真與文學求美的條件。

二、歷史的想像

曾經有論者指出：

¹ 王夢鷗：《傳記小說文學》，載於《什麼是傳記文學》，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56年，頁79。

² 莫洛華著，吳奚真譯：《現代傳記文學的特質》，載於《什麼是傳記文學》，頁48。

歷史作為一門科學，它並不需要作者自身感情貫注其間，它只要作者進行冷靜的觀察分析，客觀的加以記載；而文學則不一樣，它伴隨著強烈的情感活動，將強烈的感情融化在作品裡。³

上述論點將歷史畫為一門不帶感情的「絕對記載之學」並不恰當。事實上，對史學家而言，「想像」的運用與「真相」的釐清並非兩立，而要如何彼此兼顧，完美並行，向來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課題。

杜維運在《史學方法論 歷史想像與歷史真理》一章中曾談到史學家在進行歷史重建工作時所無法避免的問題，他提到：

不過，僅憑博學與客觀細密的研究方法，所獲得的歷史真理，是有限度的。資料的缺陷性，固不必論。即使資料是實錄，且完整無缺，而以資料中所涉及的人事，變幻無端，當事人豐富的思想，濃厚的情感，以及人世間難以筆墨盡述的奧秘，都非資料所能完全披露。所以史學家除了博覽群籍，以殫力於歷史研究外，要進一步對歷史作理解。凡自資料所不能獲得的歷史真理，賴此以彷彿其梗概。⁴

由杜氏所述我們可以了解到，若端賴史料欲藉以重現歷史，極可能遇到資料不足之憾；而倘若資料幸能俱全，卻也因無法曲盡人事當中細微之處，淪於徒顯事件表象之弊，充其量只能稱之為「事件紀錄」，終究不能躋身「歷史」之林。

杜氏又謂：「⁵一位完美的史學家，必須具有足以使其敘事感人與歷歷如繪的想

³ 郭丹：《史傳文學 - 文與史交融的時代畫卷》，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09。

⁴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增訂新版），臺北：三民書局，民國88年，頁205。

像」。敘事的感人與歷歷如繪，靠想像，思想的奧祕，情感的深處，尤非想像不能觸及。」⁵他同時也認為：「大史學家的歷史著作，所以幾於藝術品，圓而多神，渾如天成，寫作的技巧，為其表面，想像的運行，作其樞機。」⁶；大抵說的正是藝術家與工匠之間的差異。堆疊史料縱使再為豐富，也無法就此成為大家之作。誠哉斯言。我們試舉宋代王當所著的《春秋列國臣傳》，及明代劉節所撰的《春秋列傳》為例。二書雖然均以《左傳》內容為其主要所本，把當中出現的人物史料一一彙集整理成列傳的形式，在體例上與《史記》的列傳可謂一致，取材也與《史記》多有同出，然卻未能在歷史上取得高度評價與重視，何則？二書徒然堆疊史料，充其量只能算是一部「史料輯抄」；再加之缺乏個人識見，欠缺歷史想像的運行，結果即是未能見出「資料所不能獲得的歷史真理」，則撰史價值極其有限，成就自然不高；又譬若以小說來拍攝電影，雖是同樣的素材，但不同的導演，從選角、劇本的改寫；指導演員表演的技巧，畫面構成，運鏡手法等等的差異，其最後攝製出來的電影質感與風貌不僅大不相同，在藝術成就上更會有高下之分。而《史記》正以其嚴謹紮實的學術根基為其撰史基礎，又能以優美流暢的文字，輔以適度合宜的想像來進行人物塑造，正是眾多史學巨著當中，取得高度成就的顯例；這也足以說明歷史學家有賴歷史想像來逼近事實真相的重要性。

三、文學的想像

當然，我們都了解，在文學創作的過程當中，「想像的運行」是至為關鍵的

⁵杜維運：《史學方法論 歷史想像與歷史真理》，頁 211 - 212。

⁶杜維運：《史學方法論 歷史想像與歷史真理》，頁 211。

一環；而想像的發生與其發展的方向、最終形成的面貌卻毫無疑問地與作家的個人經驗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王夢鷗先生在《文學概論》一書中就曾經提到過：

所謂想像的創造，有許多只是記憶材料的變形或混合而成。沒有經驗的材料，便也無從想像。⁷

換言之，一個人有怎樣的經歷便容易產生怎樣的聯想是極其自然的事。因此，就文學的角度來看，則「想像」的發生絕對不是無中生有，無所憑式，一切俱是有跡有循；聯繫作家個人與其想像之物的絲線從未曾斷離。也有論者提到，在創作傳記文學的過程當中，其文學風格的形成與體現，無非都和傳記作者息息相關，這同時也印證了王夢鷗先生對想像的看法：

（傳記文學的文學風格）它與傳記家個人的學識修養、藝術情趣、個人生活環境等各方面的因素息息相關，密不可分。因此，它既可視為傳記家在傳記創作過程中的一種匠心獨具，更可看作是傳記家們全部的身心在其作品中的自然流露。⁸

我們同意這樣的說法。如此說來，對於「歷史的想像」而言，根植於客觀事實是必備的要件；就「文學的想像」而言，則既有想像之生，便是從作家自身經驗而來，便定然帶有個人色彩。是故綜合以上「歷史的想像」與「文學的想像」所論，我們就可以從「司馬遷如何就既有史料發揮增生合理卻又富個人特質的想像」的

⁷ 王夢鷗：《文學概論》，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80年，頁56。

⁸ 李祥年：《傳記文學概論》，安徽：安徽文藝出版社，1993年，頁105。

角度，來釐清在《史記》當中出現的所有想像之筆，究竟是由那些因素影響所致。而即由這一點，便又可以向上追溯出許多關於作者其人豐富的線索來。

四、影響司馬遷想像的因素

既然一部良史並不同於「事件實錄」，而「一部上下數千年綿延發展不絕的連貫性的歷史，實際上不存在，其連貫是出於史學家的想像」⁹，則吾人不妨準此觀點來檢視司馬遷與《史記》。由於《史記》採用「因人繫事」的紀傳體方式來建構歷史全貌，所以司馬遷更是需要時時借重想像的助益，從而發揮筆下人物的各項性格特質；突顯在關鍵的時刻中，人物的性格及人與人之間對應的關係往往決定了歷史發展的方向。因此，若無「想像」之功，我們很難見到《史記》當中每個聲口畢肖，栩栩如生的人物圖譜，甚至於一幕幕懸疑緊張，萬分驚險的歷史場景也將不復存在。例如在《史記 項羽本紀》當中說：

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之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¹⁰

這段項梁與項籍兩人之間極為私密的談話司馬遷當然不可能在現場，更遑論會有人在旁將之以文字紀錄、流傳下來。那麼太史公從何得知？這就是作者在充分了解項羽其人行事風格及性格之後，為了塑造項羽這個人物的形象，於是揣摩想像其心理，寫下如此生動的片段，對於項羽的個性可謂刻畫的入木三分。換言之，

⁹杜維運：《史學方法論 歷史的想像與歷史真理》，頁195。

¹⁰《史記 項羽本紀》，頁143。

若非作者想像之功，後代讀者便無從由許多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小事裡，一窺歷史人物的性情與心態。再說，作者司馬遷也常常是有意識、有目的地設計這樣的場景，藉由歷史人物對同一件事的不同反應中，去勾勒突顯人物之間的性格差異，試看 高祖本紀 中的一段：

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

11

從這件小事點化出兩人性格的差異於無形，同時也為往後楚漢相爭時兩人在揆人度事上的種種歧異作了註腳，實是非常高明的辦法。但是話說回來，司馬遷的各種想像究竟是從何而起，同時又受到那些個人特質所引導的呢？因此以下必須先探討可能影響司馬遷產生想像的因素，才能從中追尋其發揮想像，塑造人物時常依循的軌跡與模式。

杜維運氏曾提到引發「歷史想像」的媒介有四點，分別是：專注、同情、物證的刺激及學術的基礎。¹²在此，吾人以為，「物證的刺激」一點實可納於「學術基礎」中一併討論；而「專注」與「同情」兩項則與作家的個人特質密不可分。故以下將以「學術基礎」和「人生經歷」兩大方向來討論影響司馬遷想像的各種因素。

(一) 學術的基礎

¹¹《史記 高祖本紀》，頁 163。

¹²杜維運：《史學方法論 歷史的想像與歷史真理》，頁 217。

「運用想像於知識之上，尤其是談歷史想像所應遵守的基本法則。」¹³我們相信無端的臆測不是專業歷史學家所為，因此，「學術的基礎」確然十分重要，因為唯有紮實深厚的學問才能讓一切論述根植於客觀的基礎之上，真正做到信而有徵。是以在談論有關合理的歷史想像之前，必要從「學術的基礎」著手；而針對司馬遷學術基礎的部分，我們將綜括以「書面資料」與「實地探訪」兩點析論之：

1 書面資料

做為一個歷史學家而言，司馬遷在見聞與閱歷上都堪稱極為豐富的了。就學術的需求來看，司馬遷已具備相當優異的條件。其父司馬談為太史令，家學淵源之深厚不可小覷，同時，書面資料的彙集也在他當時獲得前所未有的完善：

（司馬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¹⁴

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¹⁵

據研究，光是司馬遷在《史記》當中所提到的參考書目，就共計有一百零四種之

¹³杜維運：《史學方法論——歷史的想像與歷史真理》，頁222。

¹⁴《史記 太史公自序》，頁1350。

¹⁵《史記 太史公自序》，頁1361。

多，¹⁶而如此龐大的閱讀數量，可謂閱觀博覽了。班固即謂：「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¹⁷張守節也說：「括文魯史而包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而摭楚漢春秋，貫紬經傳，旁搜史子。」¹⁸也正因為如此廣泛地收集、研讀相關史料，致使司馬遷在史料的甄選與取捨上的確顯得更加謹慎，不但對前代典籍史料進行綜合比對，凡未經考信的資料絕不輕易採錄，甚至進而辨析糾正其中的謬誤，足以說明司馬遷身為良史的一個嚴謹的態度。例如：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¹⁹

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恐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²⁰

若不是對各種史料有相當程度的涉獵與鑽研，很難能做到將資料如此精準客觀的

¹⁶ 據鄭之洪所錄，計「六經及其訓解書」23種，「諸子百家」50種，「古今歷史及漢室檔案」24種，「文學相關書籍」7種。《史記文獻研究》，四川：巴蜀書社，1997年，頁157。

¹⁷ 班固：《漢書 司馬遷傳》，頁1232。

¹⁸ 張守節：《史記正義序》，引自《史記》，頁11。

¹⁹ 《史記 大宛列傳》，頁1299。

²⁰ 索隱曰：「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車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盡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之耳。」，《史記 刺客列傳》，頁1018。

判斷分析。由此我們除了可以看出司馬遷覽書之博、研讀之精；更證明其身為歷史學家所具備的學術專業實乃不容置疑；而有了可靠可信的史料來源，當然對歷史的建構有著正面的助益。

2 實地探訪

司馬貞在《史記索隱後序》曾云：「太史公之書，既上序軒黃，中述戰國，或得之於名山壞宅，或取之以舊俗風謠」²¹，可知司馬遷一生的游歷對其蒐羅史料以創作《史記》有著莫大的裨益。他自己也提到：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遺風，鄉射鄒嶧；？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²²

青年時期的壯遊，及日後的扈從崆峒，奉使巴蜀等，司馬遷的足跡幾乎踏遍整個中國；不僅讓他飽覽名山大川，遍訪歷史遺蹟，有幸得與文字紀錄一一印證；同時實地勘察走訪又得到許多書中未曾記錄，流傳在當地人們口耳中的傳聞佚事。

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

²¹ 司馬貞：《史記索隱後序》，引自《史記》，頁10。

²² 《史記 太史公自序》，頁1350 - 1351。

王請降，遂滅魏。」²³

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家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²⁴

除了當地民眾口耳相傳的佚事故聞，還有地方上流傳的歌謠俚諺，這些均為太史公一一收錄入史，成了他取材的對象。既讀萬卷書，復行萬里路，更「罔羅天下放失舊聞」，如此，撰史的學術基礎是很深厚了。

歷史學家的合理想像，正端賴這樣紮實穩固的學習做其根基。杜維運氏又謂：「以學術的基礎而言，歷史想像的悠然出現，需要頗為深厚的學術作基礎。不然，將流於詩人、戲劇家、小說家的幻想。」²⁵沒有對其人其事做過通盤全面的了解，又如何能進一步合理地推想出「當事人豐富的思想，濃厚的情感」呢？反之，若一味任憑天馬行空，漫無邊際地縱橫馳騁其想像，不僅淪於「幻想」之流，更遑論其為歷史的可靠性了。故當司馬遷親臨故國，撫其遺蹟，追懷感悼，彷彿想見其為人時，想像的樞機便悠然引發了：

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²⁶

²³ 《史記 魏世家》，頁740。

²⁴ 《史記 淮陰侯列傳》，頁1066。

²⁵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 歷史想像與歷史真理》，頁203。

²⁶ 《史記 孔子世家》，頁774。

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者。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²⁷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²⁸

由此可知，有了深厚堅實的學術根基，再加上實地親臨走訪，這對於形成合理的歷史想像的確有莫大的助益；而司馬遷便在這樣的背景下成功塑造了每個栩栩如生，活靈活現的人物形象。

（二）人生的際遇

除了具備豐厚的「學術的基礎」足以引發作者的想像之外，我們更相信司馬遷個人「性格」與「人生遭遇」的因素才是最終形成《史記》當中每個歷史人物風格樣貌的重要指標。杜維運氏認為：

史學家超越的思想，又從何而來呢？天賦以外，時代、環境的影響以外，

²⁷ 《史記 信陵君列傳》，頁 960。

²⁸ 《史記 屈原賈生列傳》，頁 1010。

個人的體驗以外，哲學家所提供的最多。²⁹

這段文字說明了：歷史學家的思想必須要超越，公正，把歷史解釋真正做到真善美的境界。然而杜氏同樣還是不可避免地必須提到有關影響史學家思想形成的「天賦、時代、環境和個人的體驗」等因素。這也足以支持我們為何認為司馬遷其人生的際遇確乎對《史記》的風貌有極其重大的影響了。

而在前面「文學的想像」一節中曾述及想像的發生與作者人生境遇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司馬遷人生的經歷在他創作《史記》、處理歷史事件時，必然曾引發過一些相關的聯想與想像。

而我們又深知：「李陵之禍」可謂司馬遷一生當中最大，也是影響最鉅的事件，因此更應該以此事為中心來作深入觀察。

天漢二年（西元前 99 年），李陵兵敗降匈奴，滿朝唯司馬遷敢直言李陵之功，卻反遭武帝以為沮詆貳師將軍李廣利而為陵遊說，故下遷腐刑。在這段過程裡，司馬遷遭遇到「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³⁰的難堪窘境，是以備嘗人情的冷暖，同時更嚮往堅貞友誼的可貴；因此當他處理到歷史上相關的事件或主題時則不免感觸良多，語重心長。如 汲鄭列傳 中司馬遷便慨嘆地說道：

夫以汲黯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

²⁹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歷史敘事與歷史解釋》，頁 247。

³⁰ 報任少卿書，引自《文選》：臺北：五南出版社，民國 80 年，頁 1039。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³¹

而對於張耳陳餘於布衣時為刎頸交，然其後卻因為彼此猜忌而反目成仇，司馬遷也為此深表惋惜：

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役莫非為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³²

對於個人自身遭遇過的刻骨銘心之事，太史公寫來自是切膚之痛，體會淋漓。有關司馬遷受宮刑之恥後「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³³，其中「發憤著書之意」與《史記》當中人物有所相發明者，更是不勝枚舉。

由上當可略知關於司馬遷個人人生際遇影響沾溉《史記》之深且鉅，且一定程度地影響到其想像的發揮與運行。我們甚至可以說，由於司馬遷受到自身人生經驗裡淬煉產生的價值認定與情感偏向所左右，以致難免在進行立傳之前，早已在心中形成對傳主其人既定的印象：不論是「與我心有戚戚焉」，抑或是因理解而產生同情；甚或深詆其行，不表認同。下筆成文實乃就心中之象予以具體化。是故筆下的人物早已是飽蘸太史公個人情感的墨水所幻化而成。換言之，我們認為，司馬遷創作《史記》之時，每每將個人情感及價值取向，藉由想像的運行發

³¹ 《史記 汲鄭列傳》，頁 1 2 7 1。

³² 《史記 張耳陳餘列傳》，頁 1 0 4 8。

³³ 《文選 報任少卿書》，頁 1 0 4 2。

揮，投射到傳中人物之上。也誠如杜維運氏所言：

對人物運以道德判斷，永遠無法完全避免。傳記學家與史學家在對人物同情、洞察及將事實畢羅之際，道德判斷已在其中，這就是史學上的莫可奈何了！³⁴

是故要檢視太史公一己情感之流露，了解其衡量人物的標準所在，定要以《史記》中司馬遷個人發微獨見之處著手，如此方可精確地掌握住太史公深厚蘊藉的個人寫作意識。

³⁴杜維運：《史學方法論 傳記的特質與撰寫方法》，頁298。